

CHRISTIAN CULTURE REVIEW

4

基督教文化评论



- 20 世纪神学的历程
- 宗教的个人化
- 论人的观念
- 20 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
对宗教和基督教的态度
- 十字架上的荣耀之美
- 寻找与困惑
——早期老舍与基督教

CHRISTIAN CULTURE REVIEW

基督教文化评论
(四)

CHRISTIAN CULTURE REVIEW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黄筑荣

装帧设计：曹琼德

基督教文化评论（第四辑）

《基督教文化评论》编辑委员会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875印张 273千字

印数：0001—3000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1-03016-2/B·57 定价：10.80元

DH91/17

编者的话

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三大层面中，宗教与其物质层面相互影响，与其制度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与其思想层面不仅相互影响相互重迭，而且还在其中处于深层和核心地位。因此，在了解各个民族或国家的文明或文化时，必须研究它们同宗教的广泛深刻的关系，必须从第一和第二层面深入第三层面，探索其精神渊源，不仅识其形，而且知其神！

正如中国和东亚一些国家的文化被称为“儒教文化”，印度和南亚一些国家的文化被称为“印度教文化”，西亚和北非等地区文化被称为“伊斯兰文化”一样，如所周知，欧洲、北美、大洋洲和南美洲等地区文化被称为“基督教文化”。这种说法虽然并不全面准确，但它的确表明了这些地区现代文化的精神渊源。这种文化的当代代表之一T·S·艾略特说过：“如果基督教不存在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接着你便不得不痛苦地从头开始，并且你也不可能提得出一套现成的新文化来。你必须等到青草长高，羊吃了青草长出羊毛，然后才能把毛弄来制作一件新大衣。你得经过若干个世纪的野蛮状态。”由此可知这些地区的文化为何称为“基督教文化”。

如果把一个大洲的居民算作一户，小小的地球就只是一个“六家村”。显然，了解和理解其中四户邻人的精神状态，绝不是一件小事。何况，现在这六户人家，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解和理解他人，实际上有助于了解和理解自身。毕竟，人类的精神是相通的，各族人民“性相近，习相远”，而习俗可易，本性难移。

编辑出版这一评论集，就是想为研究基督宗教及其与社会和经济、政治和法律、道德和习俗、科学和教育、文学和艺术、哲学和各门学术等等的关系，为了解邻人的思想或基督教文化，提供一片小小的园地、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目 录

20世纪的神学泰斗	何 光	1
——卡尔·巴特		
什么是系统神学?.....	[瑞士]奥 特	19
20世纪神学的历程.....	[德国]莫尔特曼	52
“我的神学”简论	[德国]云格尔	87
宗教的个人化.....	[德国]梅 茨	107

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及其宗教观.....	安希孟	115
论人的观念	[德国]舍勒尔	131

试以《周易》“乾卦”释《马太福音》的“法		
天”	房志荣	158
碗的默想：《道德经》与东方基督教之		
虚己基督论	[美国]贝扶理	175

库尔曼的历史观及其批判	郑仰恩	192
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宗教和基督		
教的态度	邵玉铭	213
十字架上的荣耀之美	小 未	229
寻找与困惑——早期老舍与基督教	锺 珠	266
〔艺海拾贝〕		
试谈圣乐之美	姚 晖	290
巴赫的《马太受难曲》	溪 涧	295

〔人物志〕

俄罗斯文艺复兴的怪杰——卡尔萨文金亚娜 297

布尔加科夫董 友 311

〔书林一瞥〕

书评与书讯9则小 未320

20世纪的神学泰斗 ——卡尔·巴特

何 光

卡尔·巴特(Karl Barth)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基督教神学家之一,独树一帜的新正统神学的领袖。他在本世纪西方宗教思想中的崇高地位,只有马利坦(J. Maritain)、尼布尔(R. Niebuhr)和蒂里希(P. Tillich)等少数几人堪与匹敌。在新教思想史上,他已被公认为自从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以来,甚至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他开创的“上帝之道”神学,一反19世纪以来的人类中心论潮流,极大地改变了新教思想的趋向。

—

卡尔·巴特1886年5月10日生于瑞士巴塞尔。其父弗里茨·巴特(Fritz Barth)是伯尔尼大学的教会史与新约教授,其母本名安娜·萨托利乌斯(Anna Sartorius)。卡尔·巴特在伯尔尼上高中时颇属意于历史与军事,18岁时转而决定做神学家,以实现理解自己的信仰、弄清基督教对现代人有何关系这一夙愿。他先后在伯尔尼、柏林、图宾根和马堡等大学学习,曾受到许多自由主义神学大师的指导,其中有柏林大学的哈那克(A. von Harnack)、泽贝格(R. Seeberg)、卡夫坦(J. Kaftan)和龚克尔(H. Gunkel),

图宾根大学的海林(T. Haering), 以及马堡大学的 赫尔曼(W. Herrmann)、韦斯(J. Weiss)和于利歇(A. Juelicher)等人。对他的影响最大的, 是新康德主义的利奇尔派(Ritschlian)系统神学家赫尔曼。

卡尔·巴特从1909年开始担任牧职, 在劳动阶层之中进行牧牧工作。1913年与小提琴家内丽·霍夫曼(Nelly Hoffman)结婚, 生有四子一女。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社会危机的刺激, 巴特对其师辈的自由主义神学日益不满, 曾参加宗教社会主义运动(他把93名知识分子支持德皇战争政策的宣言发表的那一天, 称为“黑暗的日子”)。但他并不像一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那样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上帝之国。在重新评价自己的神学立场、深入思考神学与教会的真正任务并认真研究圣经和神学之后, 巴特于1919年发表了《论〈罗马人书〉》(Der Roemerbrief)。这本书与当时流行于自由派新教中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心理主义对抗, 突出强调上帝之“全然相异”或外在性质, 连续再版6次, 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后来巴特在提到这本书时写道: 当时他好像在黑暗的教堂钟楼中摸索着拾级而上, 一不小心突然从楼梯上滑跌下来, 为了站稳脚跟, 他只得抓住一根绳子; 随着雷鸣般的钟声响彻四方, 他才省悟到, 方才抓到手的原来是撞钟用的钟绳。

《论〈罗马人书〉》引起的轰动, 使没有博士学位的巴特登上了大学讲坛。他相继被戈廷根(1921年)、冈斯特(1925年)和波恩(1930年)等大学聘为教授。尽管如此, 这本被形容为“一颗炸弹”的书, 也遭到了不少著名神学家的猛烈抨击, 其中有不少来自巴特的师辈。另一方面, 许多年轻一代的神学家则联合起来为他辩护, 他们在这本书里发现自己的神学纲领得到了表达。其中一些后来影响很大的人, 例如布龙纳(E. Brunner)、布尔特曼(R. Bultmann)、梅茨(G. Merz)、图尔尼森(E. Thurneysen)和戈加登(F. Gogarten)等, 同他一起形成了所谓“辩证学派”。1922年, 他们

创办了《时代之间》(Zwischen den Zeiten),这份杂志作为所谓“危机神学”或(如他们所愿意称呼的)“上帝之道神学”的喉舌,在此后10年间对德国神学的形成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直到1933年被迫停刊为止。

在任教于前述三所大学期间,巴特完成了一些十分有力的论文和演说。这些论文和演说分别收入在《神之道与人之道》(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1924年)和《神学与教会》(Theology and Church)(1928年)之中。1927年,他的第一本独立的教义学试作《上帝之道的理论——基督教教义学导论》问世,对这本书的种种评论使他意识到,他仍未跳出自由派人类中心论的藩篱,而且他的神学起点同戈加登和布尔特曼等朋友有严重的分歧。于是他通盘地重新检讨自己的神学方法,力求避免把自己的神学奠基在某种生存主义人类学范围之内。这些思考的结果,就是《教会教义学》(Die Kirchliche Dogmatik)这一洋洋巨著。

巴特自始至终都坚决反对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及其控制教会的企图。他通过题名为《今日神学生存》(Theologische Existenz heute)的系列小册子澄清基本的神学问题,反对种族主义和偶像崇拜式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教会的渗透,鼓励教会抵制纳粹。1934年5月,他同反纳粹的教会领袖尼莫伊勒(M. Niemöller)等人组织召集了巴门会议(Synod of Barmen),发表了著名的《巴门宣言》,与拥护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教会分庭抗礼。在此,我们可以把作为纳粹党手中工具的“日耳曼民族福音教会”发表的“指导原则”,同主要出自巴特手笔的《巴门宣言》作一对比:

我们在种族、人民和国家当中,看到了上帝赋予我们并委托给我们的生存等级秩序。在我们看来,上帝的律法,就是要我们留心维护这些等级秩序。……

在向犹太人进行的传教活动中,我们发现对于我们的民

族性有一种严重的危险。这是让异族的血液渗入我们的政体的入口大门。……日耳曼人与犹太人之间的通婚尤其应予禁止。

我们需要一个扎根在我们的民族性之中的福音教会。我们摒弃基督教的世界公民精神。我们要依靠对上帝交付我们的民族使命的信仰，……去克服这种精神的种种腐化表现。

——“指导原则”

鉴于现存帝国教会当局之“日耳曼基督徒”的种种错误正在毁灭教会，并正在破坏德国福音教会的统一，我们要公开申明以下的福音真理：

正如圣经为我们所证实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无论生死都必须聆听、必须信赖、必须服从的唯一的上帝之道。

我们要摒弃这样一种虚妄的理论，说什么离开这唯一的上帝之道，除了这唯一的上帝之道，教会似乎还能够，还必须承认有另外的事件和力量、另外的人物和真理，作为自己声明的来源，作为上帝的启示。

我们要摒弃这样一种虚妄的理论，说什么我们的生活似乎有这样一些领域，在其中我们竟会不属于耶稣基督，而属于别的君主。

——《巴门宣言》

1934年12月，由于拒绝参加效忠希特勒的宣誓，巴特被解除了在波恩大学的教职，次年春天又被纳粹驱逐出德国。在此期间，巴塞尔市议会已选举他担任神学教授，因此他返回瑞士，任教于巴塞尔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战争期间，他向很多地方的教会及其领袖写了大量的鼓舞和劝诫性质的书信，并曾自愿报名服务于瑞士军队。

在巴塞尔，巴特继续进行《教会教义学》的写作。虽然此书他终生未能完成，但已经刊行者达4卷13部，共9000余页！这是一部真正普世主义的著作，充满了崭新的洞见和大量的释经学、历史学、哲学和教义学的资料，因此被新教和天主教两方面的学者同样视为本世纪的经典神学著作。巴特在其著述活动中最关心的是宣教任务，他认为这个任务不是宣讲人的话语，而是宣讲上帝的话语，即“上帝之道”。他发表了500多篇讲道辞，后来专在巴塞尔监狱中布道，以致人称“囚徒中的囚徒”。

终其一生，巴特在社会、国家、战争、革命、极权、民主等问题的背景之中，努力解释福音并考察教会的信息。战后，他一直倡导世界和平，反对热核武器，主张消除东西方之间的铁幕。他的国际声望也日益增长。他先后访问过法国、意大利、荷兰、英格兰、苏格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美国。在世界教会联合会(W.C.C.)第一次大会(阿姆斯特丹，1948)开幕式上，他发表了十分重要的演讲。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1962—1965)之后，他又专门访问罗马，以了解天主教会的革新。他曾获得闵斯特、格拉斯哥、爱丁堡、圣安德鲁、牛津、布达佩斯、日内瓦、斯特拉斯堡、巴黎以及芝加哥等大学的荣誉学位，波恩大学的荣誉评议员，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大学名誉教授，不列颠与外方圣经协会荣誉会员，法兰西学院道德与政治学会荣誉会员等称号和英王自由事业服务勋章。

巴特的人格特征，是他对基督福音坚定不移的虔诚奉献、对包括论敌在内的一切人的宽厚仁慈、永不满足的思想渴求、尖锐敏捷的批判性头脑，以及出于对造物主及其创造之善的意识的谦卑与愉快。他对于莫扎特的音乐有着孩童一般的喜爱。在他看来，神学是“一种特别美丽的科学”，是一项愉快的任务，因为它的研究对象，乃是“我主上帝之美”，在耶稣基督之卑微和崇高之中表达的无比佳美的福音。1962年，巴特作为“终身教授”而退休，1968年12

月9日,他在巴塞尔逝世,享年82岁。教皇庇护十二世称他为托马斯·阿奎那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一个新教神学家获得天主教方面如此称誉,是十分罕见的。

二

巴特上大学时,曾研读康德的理论与实践哲学,康德在认识论和伦理学上的“哥白尼革命”,使他痛切意识到认识上帝与侍奉上帝这两大问题。事实上,有限知性与实践理性的哲学,同上帝不可认识与侍奉上帝为要的神学,二者是可以相通的。另外,巴特对从19世纪起一直影响新教神学的施莱尔马赫神学有着终生的兴趣。他曾同施莱尔马赫一样,科学地考察基督教信仰的内容,把信条解释成教会的功能;但他又不同于施莱尔马赫,在寻求真理的标准时,他不是求诸一般的宗教体验,而是求诸圣经所证实的上帝在基督中的启示。

巴特的神学方法

巴特的神学又被称为“辩证神学”,其辩证方法的特点,不在于黑格尔式的从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的轻便转换,而在于克尔凯郭尔式的真理与真理之间的张力或冲突。由于神学的基础是神的启示,神学语言力求表达上帝超越性之纵面与人类生存之横面的交叉,而永恒与时间这两个无法类比的世界的结合,也只能用悖论或佯谬(Paradox)的方式来表达,因此,对上帝的认识不可能是直接的。依靠教义学说或借助神秘修行而企图直接达到真理,都是必定要失败的。只有第三条道路即辩证方法,才是最佳的途径。“这种方法自始即积极认真地一面发展关于上帝的观念,一面又促进对于人和一切人间事物的批判。但这两个方面在此并非分别孤立

地予以考虑，而是一直彼此相提并论并涉及二者的共同前提，涉及那活生生的真理，那真理固然无以名之，却处于二者之间并赋予意义，给予解释。”(K. Barth: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1957, p. 206.) 然而辩证方法永远不能达致确定的解决或固定的结论，“在这条狭窄的山脊上，一个人只能不停地走。如果他想站住不动，就会向右或向左跌倒，反正必得跌倒。在此所能做的，只有不停走动——在未能摆脱晕眩的人看来，这是吓人的表演——不停地从一边看另一边，从正面看反面，又从反面看正面。我们的任务，就是解释‘是’与‘否’，比肩而立的‘是’与‘否’，而不在任一确定的‘是’或任一确定的‘否’上面延搁片刻。例如，言及上帝在创世中的荣耀，只是要立即转而强调上帝在造物中完全对我们隐匿不现；……言及人乃按上帝形象造成，只是要提出最终的警告：我们所知的人，乃是堕落的人，我们对人的可怜，比对人的光荣所知更多。……一个基督徒，就是万物的主人，并不受制于任何人——一个基督徒，就是万物的奴隶，并且受制于每个人。”(前引书，页 207—208) 自由派神学认为人可以直接认识上帝，因此对这种辩证法会感到困惑；但巴特认为，人无法在自己有限的表述中把握永恒上帝的真理，人只能为上帝自我启示的悖论作见证。他写道：“假如你问到上帝，假如真要我谈论上帝，那么，能够期待于我者，唯有辩证法而已。……不论是我的肯定，还是我的否定，都无权自称即是上帝的真相。我的肯定或否定，都不过是对于那真相的一个见证，那真相乃位于核心之中，在每一个‘是’与每一个‘否’之间。”(前引书，页 209) 只有辩证方法，才能维护这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上帝不是人，因为他超乎有限领域之外；同时，他又在有限领域之内启示出自身。

上帝乃“全然相异者”

上帝在时间或历史中的自我启示，具有“全然相异”(the

Wholly Otherness) 的性质。这正是他的神性之表现, 突出了他同人之间的距离。巴特的这一论点, 同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依靠人的潜力和人的经验来认识上帝的论点截然对立。他认为, 神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强调神人之间的无限距离。他在《论〈罗马人书〉》1922年版的“序言”里写道: “如果说我有一个体系, 它也只限于对克尔凯郭尔所谓时间与永恒之间‘无限的质的区别’的认识, 只限于我的这个考虑——下面这句话既有肯定的意义, 也有否定的意义: ‘上帝在天上, 而你在地上。’”(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1960, p. 10.)

巴特的神学又被称为“危机神学”。他把无法从造物直接认识上帝称为一种“大有裨益的危机”。他说: “如果我们只想明明白白地看见, 我们就已经处于这个危机之中了。可以明明白白地看见是无可争辩地实在的, 就是上帝之不可见, 而这正是, 也严格符合于复活之福音——上帝的永能和神性。这除了意味着我们不能认识上帝, 我们不是上帝, 应该畏惧我们的主以外, 还能意味着什么呢?”(前引书, 页 46—47) 在这危机之中, 我们会明白, 从我们这些被造物的角度来看, 上帝是隐匿的、未知的。因为, *Finitum non capax infiniti* (有限者不可能包容无限者), 上帝是全然外在者, 他并不直接出现在人心或自然之中。“从人到神, 无路可通。”

然而, 从神到人, 却有通路——即上帝惠予的自我启示之路。只有依靠上帝自身, 依靠他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 才能认识上帝。于是, 对人来说不可能的事情, 上帝使之成为可能了。上帝在基督里启示了自身。然而已经启示出来的上帝, 也是隐匿着的上帝。对耶稣基督中的上帝的认识, 与上帝的隐秘性, 这两者佯谬地合而为一。在作为基督的耶稣那里, 我们看见的是上帝令人敬畏的隐秘性。然而, 这“看见”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看见, 它需要一双信仰的眼睛, 而这乃是恩典的赐予。上帝的启示总是非直接的、掩盖着的, 从而是需要恩典才能看见的, 因为它出现于其中的这个世界, 是由

罪与“肉”统治着。启示乃是奥秘，它不仅标志着上帝的隐秘性，而且标志着他以一种隐秘或不明显的方式显示自己。“在启示中，在耶稣基督中，隐匿的上帝确实使自己成为可以理解的了。但并非直接地，而是间接地；并非对眼睛而言，而是对信仰而言；并非在其存在之中，而是在其征象之中。”(K.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 Edinburgh, 1956, p. 199.) 耶稣基督之中的上帝启示之隐秘性和神秘，更表现在其悖论或佯谬性质之中。恩典与审判、爱与福音、信仰与事工，根本就无法分离。“上帝的天谴和审判，只不过是上帝恩典的坚硬外壳，……然而只有知道上帝恩典的人……才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天谴和审判。”(Church Dogmatics, I, 1, New York, 1936, pp. 204—205.) 在此世看来，这种启示之神秘的“内在两面性”不过是荒谬，只有信仰之恩赐，才能造成神圣的转换评价，才能使上帝的存在与作为之相异性和奥秘，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

“圣经的奇妙世界”

巴特的神学又被称为“上帝之道神学”。所谓上帝之道，乃以基督为核心，而圣经又为基督作了见证。正是在圣经之中，我们听见了上帝之道，了解到它的独一无二性，以及它同一切人类知识的不连续性。“在圣经之中，有一个奇妙的新世界，即上帝的世界。”

巴特写道：“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圣经都对他们的的问题给出他们应得的回答。我们总是会在其中找到我们所探求的那么多的东西，不多也不少：如果我们探求的是高尚而神圣的内容，那么就会找到高尚而神圣的内容；如果我们探求的是无常的和‘历史中的’内容，那么就会找到无常的和‘历史中的’内容；如果我们什么也不探求，那就什么也没有。……‘圣经里有些什么？’这个问题有一种限制性的方式转化成相反的问题：‘喂，你在寻找什么？’”(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p. 32.) 然而巴特的圣经观也体现出鲜明的辩证性。他认为，在细致考察之下，圣经实

在很少包含在历史、道德和宗教领域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他毫不含糊地逐一指出，圣经在这些领域几乎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他认为，这是因为圣经乃是对于“彼岸的、新的、更伟大的世界”的见证。“构成圣经之内容的，不是人类关于上帝的思想，而是上帝关于人类的~~思想~~。圣经并不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同上帝谈话，而只告诉我们他对我们说些什么；并不告诉我们如何找到通向他的道路，而只告诉我们他如何寻找并找到了通向我们的道路。……我们已经在圣经里找到了一个新世界，找到了上帝，上帝的至上权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不可参透的爱。那不是人的历史，而是神的历史！不是人的美德，而是把我们召出黑暗引入他奇妙的光明之中的神的美德！不是人类的立场，而是上帝的立场！”（前引书，页 45）在圣经里，我们找到的是上帝那不可理解的存在与作为之世界。只有在走向上帝的世界时，我们才遇到了危机，才省悟到人的所有的思想和期望之相对性质。“‘看哪，我更新了一切！’新约中对上帝、人类、世界的肯定，仅仅奠基于绝对超越人类思想的一种新秩序的可能性。因此，作为那种新秩序的先决条件，必然先来一场否定一切人类思想的危机。”（前引书，页 80）

巴特和新正统派不但接受圣经批判的成果，而且坚持认为，圣经本身具有彻底的凡人性质和会失误的性质。巴特说：“圣经是近东地区一个古代种族性宗教和一个希腊化崇拜性宗教的文字纪念碑，一部像别的任何文献一样的凡人的文献。”（前引书，页 60）这就是说，它的作者或见证人是会失误的凡人，他们的历史和科学判断常常是错误的，他们带有当时当地的文化特点。巴特甚至说：众先知和使徒们也是“历史中的凡人”，“在他们的活动中，他们也有罪性”。但是，说圣经是人写的话，只等于说了一半真理，因为圣经又是上帝的话。当然，它作为上帝之道的启示性质，只能依靠恩典的奇迹才能被人认知。在巴特看来，圣经不是一种我们可以控制的“内容”，甚至说圣经就是上帝之道也不很恰当。正相反，我们只